

20世紀上半葉 遷居香港的澳門葡萄牙人

葉 農*

澳門葡人在鴉片戰爭之後大量遷居香港地區謀生，成為世界民族史與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根據現有史料，在對19世紀下半葉澳門葡人遷居香港問題研究的基礎上，以20世紀上半葉為時段，探討了下列問題：20世紀上半葉澳門葡人繼續遷居香港、回遷澳門及其政治生活，居港葡人的經濟生活，居港葡人的社會生活，居港葡人精英分子研究澳門史的學術活動。

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澳門的政治、經濟陷入困境，澳門葡萄牙人(以下簡稱“澳門葡人”)陷入極大的生存困境；同時香港被英國人佔領，香港的開發建設，又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與謀生手段，使大量澳門葡人離開澳門，移居到香港。澳門葡人移居香港，是世界民族史與中國近代史領域中一個不太被學術界特別是中國學術界重視的問題。中外學術界主要研究的領域是澳門土生葡人族群，出現過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等早期研究者，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現了阿馬羅(Ana Maria Amaro)、萊薩(Almerindo Lessa)、賈淵(João de Pina Cabral)、陸凌梭(Nelson Lourenço)、歐卓志(Jorge de Abreu Arrimar)、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白姐麗(Graciete Batalha)等研究者，而中國學者則有湯開建、徐傑舜、金國平、吳志良、李長森等。

澳門葡人遷居香港，是世界民族史與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加全

面地瞭解香港近代發展史、近現代民族發展史。因此，筆者根據現有的史料，依據相關的理論，分兩個階段對澳門葡人在香港的活動展開研究，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此問題的重視。

第一個階段，係19世紀下半葉澳門葡人移居香港。在這個階段，澳門葡人大量向香港遷居，該族群有着相當固定的居住區，過着有其自身特色的經濟、社會生活，組織了自己的社團，使用着自己獨有的語言，出版了葡萄牙文報紙，成為在香港居住的一個相當獨特的族群。⁽¹⁾第二個階段，係20世紀上半葉。在這一階段，遷居香港的澳門葡人經過半個多世紀在香港的定居生活，在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有了一些新的發展。本文主要研究下列問題：其一，澳門葡人繼續遷居香港、回遷澳門及其政治生活；其二，澳門葡人在香港的經濟生活；其三，澳門葡人在香港的社會生活；其四，居港葡人精英分子研究澳門史的學術活動。

* 葉農，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

20世紀上半葉澳門葡人 繼續遷居香港、回遷澳門及其政治生活

20世紀上半葉，澳門葡人繼續遷居香港，同時居港葡人在政治生活方面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在19世紀下半葉，澳門葡人遷居香港具有家族性、長期性、謀生性、融合性的特點。進入20世紀以後，一方面澳門葡人繼續遷居香港，成為了居港葡人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居港葡人開始積極參與香港政治。主要體現在：當香港面臨戰爭威脅時，居港葡人積極參加保衛香港與救濟戰爭災難的活動；一些居港葡人精英分子積極參政，為葡人社區謀求福利；而當香港面臨困境時，他們又回遷澳門，並在澳門避難。

一、澳門葡人繼續遷居香港與回遷澳門

進入20世紀，澳門葡人繼續遷居香港。同時，隨着居港葡人新一代的誕生，香港葡人社區獲得了新發展。據李長森的研究，20世紀上半葉遷居香港的澳門葡人家族主要有：科斯塔(Henrique Gomes da Costa)，1884年生於里斯本，先隨家人從葡萄牙遷居澳門，再從澳門遷往上海，在上海同華人女子阿梅利亞(Amélia Liang Loo Noi)結婚，歿於上海，其家族在上海發展，20世紀中期前後再次移民至香港及加拿大等地；阿爾梅達(Júlio Maria de Jesus Hundman de Almeida)，該家族創始人為老楞佐·若瑟·阿爾梅達(Lourenço José de Almeida)，阿爾梅達為該家族第六代，於20世紀初移居香港，1958年移居美國，子孫輩多在香港出生；奧瓦雷斯(Fernando José Álvares)，該家族創始人為安東尼奧·拉法爾·奧瓦雷斯(António Rafael Álvares)，奧瓦雷斯是該家族第九代，於20世紀初在香港定居；官也(Cunha)家族，安東尼奧·官也(António da Cunha)係該家族的創始人，該家族至20世紀中期才有人遷居香港，等等。⁽²⁾

在此階段，居港葡人中也出現了許多精英人士，如罷辣架、白樂嘉父子(José Pedro Braga; José Maria Braga)、格拉沙醫生(Filomeno José

de Graça Osório)、羅德里格斯醫生(Alberto Maria Rodrigues)、阿爾納爾多(Arnaldo de Oliveira Sales)、羅泊(Rogério Hyndman Lobo)等。

在一些特定情況下，也會出現反向遷居。如香港被日軍佔領之後，許多居港葡人家族回遷澳門，並得到澳葡政府的救助。安東尼奧·帕謝科(António M. Pacheco Jorge da Silva)稱：“戰爭的結局是使許多葡人家庭返回了他們的根，他們祖輩居住過的家園——澳門。他們在香港已經無以謀生，因為所有的資產不是被凍結，就是被強迫交換成了毫無價值的日軍軍用手票。許多人牽兒帶女來到澳門，等待戰爭的結束。澳葡政府張開雙臂，接受這些戰爭的受害者。在澳門狹窄的住所裡，安置他們。”⁽³⁾

1942年2月，首批香港葡人難民抵達澳門，被安置在酒店、學校、私人住宅、俱樂部及教區，甚至寮屋(當地方言，即簡陋的房屋)中。這些難民因在香港生活數代，已融入英人社會，精通英語但對葡語生疏，故此，在1943年2月21日，《澳門之聲報》(A Voz de Macau)創辦英文副刊《澳門先驅週報》(Macau Herald)，以應需求。《澳門先驅週報》出版至同年4月。⁽⁴⁾該報編輯主要是杜阿爾特·巴蒂斯塔(Duarte C. Baptista)和皮亞·李美離(Maria Pia dos Remédios)。該報社論多由英國駐澳門領事包納爾·萊維斯(John Pownell Reeves)撰寫，史學家白樂嘉亦偶爾見諸報端。6月，大約有1,000名移居香港的澳門葡人回到澳門。澳門總督戴思樂(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拿出澳門的全部博彩業稅收，救助這些難民，總額高達兩百萬澳門圓。⁽⁵⁾

到1949年，又有一批生活在中國內地的葡萄牙人通過香港來到澳門。1949年4月28日《香港虎報》(Hong Kong Standard)報導：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華南地區取得明顯優勢時，澳門政府草擬了一份應對緊急情況計劃，以便撤出在上海的200名葡萄牙僑民。⁽⁶⁾這批人後來多經過香港來到澳門，並帶來了資本和專業技能。5月14日，澳門政府宣佈準備接待來自上海的葡萄牙人，收容所

設在原娛樂戲院（位於罈些喇提督馬路（Avenida do Almirante Lacerda），主要放映中國電影，黃豫樵曾擔任司理）之舊址。至1950年，共收容葡籍男難民20人、女難民約100人，其費用全部由澳葡政府支付。⁽⁷⁾

二、居港葡人與世界大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作為參戰國，需要抽調兵力用於歐洲戰場，因而用於香港防衛的兵力很少。這時，許多居港葡人積極參加香港的防衛工作。白樂嘉稱：“在某種程度上，居港葡人在1914-1918年的戰爭期間，變得重要了。在戰爭威脅下，英國政府決定撤出在香港服務的軍隊，而祇在香港留下極少的駐軍。為了彌補香港防衛兵力的不足，港英政府決定實施擴充義勇防衛軍與員警後備隊的計劃。在香港進行出生登記的葡人即英國臣民，加入義勇防衛軍；保留葡籍的葡人一般加入員警後備隊。在後來的組隊中，還有一支樂隊，其大部分成員為葡人。”⁽⁸⁾ 卡斯楚（Leo d' Almada e Castro）稱：“[香港] 葡萄牙人社區對殖民地的戰事所做的貢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經形成了。許多人參加了香港義勇防衛軍並在香港員警後備隊的葡萄牙連服務。”⁽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港葡人又為保衛香港做出了貢獻。安東尼奧·帕謝科稱：“二戰爆發時，在香港自願保衛隊的葡人參與了保衛殖民地。不像職業士兵，自願者們不僅是保衛香港，而且還是保衛他們自己的家園與家人。(……) 在戰爭爆發時，葡萄牙婦女參加了護理等輔助勤務，並幫助設在香港島上的聖保祿醫院、設在九龍塘的沙喇書院救濟醫院、瑪利諾修院急救站的職員。(……) 差不多有300名葡萄牙公民參加在[1941年] 耶誕節前幾個星期的戰鬥。至戰爭結束，他們中的二十六位失去了生命。(……) 香港在聖誕日投降日軍。在英國防衛部隊中服役的葡人被送到深水埗戰俘集中營。其中一些人被送到了日本的勞工營。”⁽¹⁰⁾

再如白樂嘉。他於1897年5月22日生於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擔任英軍與中國自由抵

抗力量之間的聯絡官，組織了秘密通訊站在香港、澳門與重慶之間傳遞重要資訊，並在中國內地建立了敵後電臺。1949年，他榮膺聖地牙哥寶劍（Santiago da Espada）騎士勳章。⁽¹¹⁾

三、居港葡人與中國民主革命

香港是中國近代維新變法、民主革命的思想發源地和活動組織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港、澳兩地的中外人士給予了大量支持是重要原因之一。向孫中山提供支持的中外人士中，就有在港、澳兩地生活與活動的葡人。澳門著名報人飛南第（Francisco Fernandes）就是其中之一。他又名飛若瑟，俗稱飛二。他於1863年2月13日生於澳門，比孫中山年長三歲。父親尼閣老·飛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在澳門開辦一家印刷公司——商務印字館（Topografia Mercantil），主要經營出版、印刷業務，負責負責制澳門政府憲報（Governo Boletim）、葡文報刊等。他自澳門利宵中學畢業後前往香港定居。他一方面和居港葡人的出版機構保持聯繫，以累積辦報經驗；另一方面，利用自己掌握英、葡、漢語的優勢，進入香港最高法院秘書部門擔任翻譯員。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1887-1892），因好談政治、鼓吹革命，被人指責參與暴動、投擲炸彈，因而捲入一些法律訴訟。在法庭上，孫中山結識了擔任法院翻譯的飛南第，並獲得後者的巨大幫助，例如推薦孫中山進入澳門鏡湖醫院、通過其創辦的報紙《鏡海叢報》和葡文報紙《澳門土生回聲報》（*Echo Macaense*）向孫中山提供幫助等。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在廣州發動了反清武裝起義，這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的第一次反清起義，史稱“廣州乙未興中會起義”。但此次起義因故失敗之後，一批革命人士，如陸皓東等犧牲，孫中山亦遭清政府通緝。他被迫逃到澳門，潛入飛南第在澳門下環街3號寓中避難。飛南第一方面努力說服澳督高士德（José Maria de Souza Horta e Costa）低調處理此事，另一方面迅速用小船將孫中山秘密送往香港，並經香港逃往日本而

成功脫險。之後，他們之間保持書信往來。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邀請飛南第出任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部長，但被飛南第婉言謝絕。⁽¹²⁾

四、居港葡人積極參與香港政治生活

在19世紀下半葉，居港澳門葡人主要係前來謀生，他們既非佔領者，亦非管治者，其中絕大多數人是抱著擺脫貧困的目的來港，故他們對香港的政治是不關心的。但進入20世紀之後，居港澳門葡人中的一些精英分子積極投身到香港的政治生活中，為葡人社區謀求福利，並獲得了相當高的個人榮譽，同時也提高了葡人社區的影響力。

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罷辣架。他是傳媒工作者及政治家，曾任香港立法局首位葡籍非官守議員、潔淨局非官守局紳以及中華電力公司主席等職。他1871年生於香港，父母的家族都長年扎根澳門及香港兩地，並信奉天主教。其外祖父羅啞乜 (Delfino Noronha) 為香港早期的印刷商，其開辦的印刷公司為港府承印書刊，曾獲港督麥當奴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爵士贊許，後來更成為香港印務局的前身。他年幼時入讀義大利嬰堂 (Italian Convent School)，後入聖若瑟書院 (Saint Joseph's College)，曾是聖若瑟書院內的活躍分子，率先在1887年領導創立舊生會，後來任聖若瑟書院協會主席，並參與聖若瑟書院在九龍界限街購地興建喇沙書院 (La Salle College) 一事。喇沙書院復於1932年開幕。他離開聖若瑟書院後，前往英屬印度，就讀於加爾各答大學。在大學期末考試中，他是唯一一位取得獎學金的歐洲大陸組別學生。畢業返港後，曾從事不同工作，至1902年起獲聘為士蔑西報司理，打理該報營運至1910年，並轉任路透社香港特派記者，在職特派記者多年，因為熱心參與社會活動而漸受重視，1919年奉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至1921年奉委為瓜地馬拉駐港領事。他曾娶奧利夫·寶玲·波拉德 (Olive Pauline Pollard) 為妻，兒子包括：白樂嘉，與妻子奧古斯塔·伊莎貝拉 (Augusta Isabel da Conceição Osorio da

Luz) 在1924年12月30日於澳門結婚，兩人育有七名孩子；約翰 (John Vincent Braga)，信奉基督教，1940年8月24日在九龍聖安德列堂娶愛丁堡大學醫科生路易莎·溫妮費德·艾什頓 (Louisa Winifred Ashton) 為妻。⁽¹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香港，如同英國人早期在澳門一般，早期居港葡人在港英政府及英資機構裡最多祇能出任中層的職位，薪酬待遇也較差。為爭取葡人在香港獲得較佳權益，罷辣架曾參與不少社會活動，要求港英政府正視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他曾經在1921年與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普樂爵士 (Sir Henry Pollock) 及大律師羅文錦合作，舉辦活動，要求消除種族、階級及宗教歧視，並取得一定的成效。香港的立法局早於1880年起已開始有華人議席，但葡萄牙人在議會卻一直沒有代表，以致其利益未能充分反映。經多年爭取，港督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爵士在1929年1月對立法局進行大幅改組，並首度在立法局內為葡籍人士加設代表議席，由罷辣架出任，他遂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立法局葡籍議員。當時的立法局由十名官守議員和八名非官守議員組成，其中有三名華人和一名葡人。此後立法局內定必有一位非官守議員由葡萄牙人出任，這個做法到1985年才予以取消。⁽¹⁴⁾ 卡斯楚稱：“罷辣架 (……) 熱心地與對葡人的歧視戰鬥，並成為首位立法局葡籍議員。當他首次出席該局會議時，金文泰總督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歡迎他：‘我歡迎葡人社區的首位代表參加到本局裡來。我們所有的人都欣賞居住於此的葡人社區的價值；我們亦滿意於罷辣架先生 (……) 開始了在立法局裡代表那個葡人社區。同樣為人所知的是，葡人從1916年起，在市政局及其前身裡，就有議員了。’”⁽¹⁵⁾

罷辣架在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期間，以經常在議會發言及工作很投入著稱。他除了關注香港的各項重大議題及九龍地區事務外，還出任過香港廣播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義勇防衛軍顧問委員會成員等職。另外，他尤其關注新界的農業事務。在

其協助下，新界在1932年舉辦了首屆農產展覽會，成功向外推廣香港的農產品。同時，因他居住在九龍，所以也是九龍居民協會的成員。而早在1926年，他就獲港英政府的委任以臨時局紳身份出席潔淨局會議，至1927年12月更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為潔淨局紳。1933年1月，他獲續任立法局議員之職，至1935年6月3日獲英廷獎授OBE勳銜。港英政府為表彰其貢獻，於1936年特將九龍一條新建街道命名“布力架道”(Braga Circuit)。1937年1月任滿卸任，由大律師廖亞孖打(Leo d'Almada e Castro)接替，但他沒有因此退出公眾場合，並參與籌備香港慶祝英皇喬治六世加冕的大型活動，而且還繼續不時在報章撰寫評論文章。⁽¹⁶⁾

除了罷辣架之外，曾擔任過香港立法局議員的葡人還有廖亞孖打(Leo d'Almada e Castro)。他是在香港的首位葡籍大律師，也是罷辣架在香港立法局的繼任者。⁽¹⁷⁾ 司爾瓦-內多(A. F. C. Silva-Netto)也曾擔任過香港立法局議員。卡斯楚稱：“近年來，人們必須提及司爾瓦-內多先生，前任西洋會所(Club Lusitano)主席和擔任過一段時間的立法局議員。”⁽¹⁸⁾

居港葡人的經濟生活

進入20世紀後，隨着遷港澳門葡人的定居，其經濟生活與19世紀下半葉相比有了一些新的拓展。

一、從事法律工作

法律工作是20世紀新生代葡人的一個新的謀生領域。從事法律工作的居港澳門葡人，主要是擔任律師，這與新生代葡人所受教育水準提高有關。這方面代表人物有：奧雷利亞諾·古特雷斯·若爾熱(Aureliano Guterres Jorge)、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恩里克·A·德·巴羅斯·博特略(Henrique A. de Barros Botelho)、克里斯多夫·保羅(Christopher Paulo)等以及上述的廖亞孖打。⁽¹⁹⁾

此外，19世紀下半葉最早隨英國商務監督機構遷居香港的列奧納多(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和其弟若瑟(José Maria d'Almada e Castro)的子孫輩中，亦有人擔任律師。罷辣架稱：“列奧納多其他的兒子，尊敬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 d'Almada)和大列奧納多(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 Senior)都是香港的律師，幹得都很好。沙勿略之子以其父親之名為名，同樣繼續了其父親的職業。而大列奧納多長子即尊敬的小列奧納多(Leonard d'Almada e Castro, Jr.)，亦是出庭律師，1937年被任命為香港立法議員。其次子C·奧馬達(C. d'Almada e Castro)，在1941年11月，被任命為香港助理皇家律師。至於若瑟·奧馬達·卡斯楚先生的女兒們，長女瑪麗亞·特拉莎(Maria Theresa)，與亞歷山德利諾(Alexandrino dos Remedios)結婚，其子女中，若瑟(J. M. d'Almada e Remedios)，是香港的律師。”⁽²⁰⁾

二、開辦企業

香港被英國侵佔六十年後，早年隨英國人來港定居的澳門葡人所開設的企業，能夠生存下來的已經寥寥無幾。進入20世紀後，由較晚移居香港的澳門葡人和新生代葡人所開設的企業興起。而這些新企業的誕生，得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界對中國產品需求的大增，中國內地產品通過香港向外出口的貿易繁榮起來。居港的葡人抓住這個機會，創辦自己的企業。白樂嘉說：“葡萄牙商人在利用香港提供的機會方面沒有遲鈍。幾家新企業建立起來。早年在香港繁盛的葡萄牙企業幾乎沒有存在下來的，它們被其它的企業所取代。其中一些還是早年那些企業的繼承者。在這些葡萄牙企業中，20世紀頭十年運作良好者有：雷梅迪奧斯公司(J. J. dos Remedios & Company)、布蘭當公司(Brandão & Company)、蘇亞雷斯公司(Soares & Company)、博特略·布拉沙公司(Botelho Brothers; Braga & Company)、東方藥房(Oriental Dispensary)和V. L. 雷梅迪奧斯公司(V. L. dos Remedios)。在印刷企業中，羅啞也公司(Noronha & Company)仍

然繁盛，其他的葡萄牙人開辦的印刷公司還有香港印刷公司（The Hong Kong Printing Press）、中央印刷公司（The Central Printing Company）、古埃德斯公司（Guedes & Company）和古鐵雷茲（R. F. Guierrez）。”⁽²¹⁾

除開上述印刷行業等企業外，還有居港葡人經營進出口貿易和航運業。布拉茲·博特略（Braz Joaquim Heitor Botelho）1876年2月26日生於香港，其父輩是最早一批去香港發展的澳門土生葡人之一。布拉茲·博特略同其兄弟佩德羅·博特略（Pedro Vicent Heitor Botelho）和安東尼奧·博特略（António Alexandrino Heitor Botelho）在香港共同創辦“紹和洋行”（Botelho Bros），成為香港早期重要的企業。該洋行總部設在香港亞歷山大大廈，並在中國的上海、美國的三藩市和紐約等城市設有分公司，這在當時是規模很大的跨國公司，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和航運業，專營西班牙皇家運輸。其兄安東尼奧·博特略於1920年在香港病逝。其弟佩德羅·博特略曾任香港九龍娛樂總會主席，後在天津去世。⁽²²⁾

居港澳門葡人中的精英大部分為商業領域的成功人士。如罷辣架退出路透社後轉而從商，自資成立罷辣架公司（Braga & Co.），並任中華互濟貸款及按揭有限公司（China Provident Loan and Mortgage Co., Ltd.）、香港、廣東及澳門輪船公司（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u Steamboat Co., Ltd.）、香港製繩有限公司（Hong Kong Rope Manufacturing Co., Ltd.）以及山打根電力有限公司（Sandakan Light & Power Co., Ltd.）的董事，另外也出任過建新營造有限公司（Hong Kong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 Ltd.）的主席。他與中華電力公司有深厚的關係，自1928年至1944年出任該公司董事，並分別在1934年及1938年出任公司主席。其次子約翰則出任過該公司的助理秘書之職。⁽⁴²⁾

三、從事醫療工作

居港澳門葡人中還有一些人從事醫療工作，這也是其所從事的一項傳統工作。進入20世紀，醫療工作仍然是他們安身立命的行業。一些居港

葡人通過在香港和英國接受醫學教育，畢業後就在香港行醫。如奧佐里奧（F. M. Ozorio）醫生曾在著名的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學習，而且是該書院葡人學生中最出色的。在早期遷港的澳門葡人中，去英國接受醫學教育者有老楞佐·馬葵士（Lourenço Marques）醫生和高美士（A. S. Gomes）醫生。他們完成學業後都返回了香港，前者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得學位，為香港政府服務；後者自己開業。而且老楞佐·馬葵士醫生還成為香港西醫書院的第一批教師，而中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則是該書院第一批畢業的學生。其他著名的葡籍醫生還有：格拉沙醫生1892年出生於香港，是首位獲選擔任潔淨局議員的葡籍人）及其侄帕西醫生（Horácio Luís Percy Osório，在二戰期間擔任香港英軍協助團的上尉）；羅德里格斯醫生1911年出生於香港，1935年在香港大學獲得藥學與醫學學士學位，曾擔任香港義勇防衛軍的醫官）等。⁽²⁴⁾

四、從事會計工作

19世紀下半葉，從事簿記工作是居港葡人的主要職業。20世紀仍然有葡人從事此項工作。如卡斯楚稱：“羅沙（C. A. da Rosa）先生，一位特許會計師和一位有很高能力而能在許多本地公司的董事局有席位的人士。”⁽²⁵⁾

居港葡人的社會生活

居港葡人在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生活是研究本課題的一個重要方面。與19世紀下半葉相比，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進行探討，以展現居港葡人在社會生活方面的新發展：

一、組織新社團與創辦基金

居港葡人在19世紀下半葉曾組織過多個社團。20世紀上半葉居港葡人新建立組織的有：

1) 葡萄牙人互助會（Associação Portuguesa de Socorro Mútuos）。顧名思義，這是一個葡萄牙人的互助組織。葡萄牙人互助會為香港葡人社區內的許多人提供了資助與獎學金。⁽²⁶⁾ 安東尼

奧·帕謝科稱：“葡萄牙人互助會成立於1915年，由蘇亞雷斯（Francisco Paulo de Vasconcellos Soares）組織。該會的主要目的是：對暫時處於悲慘境地的會員給予幫助，支持互助教育，建立有益的建築基金，提昇葡人社區的整體福利和會員間的溝通。”⁽²⁷⁾

2) 蘇亞雷斯獎學金基金（Inêz Soares Scholarship Fund）。安東尼奧·帕謝科稱：“阿當·瑪利亞·蘇亞雷斯（Adão Maria Soares），一位巨富與貴金屬經紀人，為了紀念其妻子，建立了蘇亞雷斯獎學金基金。他打算將部分基金用於我們年輕人的大學教育，特別是那些學醫的年輕人。羅德里格斯爵士（Sir Albert Rodrigues）亦為這些受益者之一。”⁽²⁸⁾ 卡斯楚稱：“蘇亞雷斯（A. M. Soares），一位知名的商人和香港大學蘇亞雷斯獎學金（Inez Soares Scholarship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創始人。”⁽²⁹⁾

3) 葡萄牙學會（Portuguese Institute）。這是由葡萄牙駐香港領事根據他人建議所創辦的一個文化機構。白樂嘉稱：“它在一段時間內相當活躍，舉辦了許多演講、展覽、音樂會和其他活動。（……）一些關於葡萄牙文化與活動的演講極受歡迎。因此產生了一個要求，即創辦一份簡報來報導它的活動。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很高興地同意擔任其監管人，出席其開幕式並獲得榮譽退休會員資格。”⁽³⁰⁾

二、出版報紙刊物

出版報刊是居港葡人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19世紀下半葉，有一批葡文報刊在香港出版；進入20世紀，居港葡人又創辦了一些新的葡文報刊。新創辦的葡文報刊主要有：

1) 1902年7月23日，葡文報紙《愛國者》（*O Patriota*）在香港德輔道中41號出版，由羅啞也印字館印刷。它係文學及新聞綜合性週刊，1904年4月10日停刊。⁽³¹⁾

2) 1913年11月20日，《葡人報》（*O Português*）在香港創辦，主編為安東尼奧·蘇亞雷斯（António de Vasconcelos Soares）。這份報紙具

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尤其在鴉片問題上猛烈抨擊澳督美珊枝（Anibal Augusto Sanches de Miranda）。最終在澳門政府的巨大壓力之下不得不於1914年1月10日宣佈停刊，共發行七期。⁽³²⁾

3) 1928年9月，葡文月刊《爆竹》（*O Petardo*）在香港創辦，科斯塔（Isidoro Maria da Costa）任主編，編輯部設在澳門，印刷、出版在香港都爹利街（Duddel Street）3號。它以抨擊澳督巴波沙及澳葡政府為目的。香港警方在1929年9月對其進行調查，後將調查結果通報葡萄牙駐港領事。科斯塔被迫在次年9月將《爆竹》停刊，但他繼續在香港英文報紙《中國事實報》（*China Truth*）上發表文章抨擊巴波沙總督（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企圖推翻澳門政府，並使葡萄牙國家在外國人面前威信掃地。1930年12月，香港警員突然搜查科斯塔的住所，查封了科斯塔與其他人相互串聯的一批信件。⁽³³⁾

4) 1929年12月，白樂嘉創辦葡、英雙語刊物《澳門視界報》（*Macao Review*），至1930年11月停刊。他負責編撰該刊的英文版，並於此發表自己第一批史學研究作品。⁽³⁴⁾

三、開辦葡萄牙語教育

居港葡人重視其子弟的教育問題。19世紀下半葉，天主教教會所辦的學校是居港葡人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場所，居港葡人與天主教神父通過子女教育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到20世紀上半葉，香港葡人社區的教育出現一些新的現象。一是在澳門的葡人送其子弟來香港接受教育。如1910年，560名葡人學生離開澳門前往香港及上海就學。這些葡人學生完成中學學業後，多在香港的外國企業中謀求職務或昇讀剛剛成立的香港大學。⁽³⁵⁾ 二是澳葡政府重視居港葡人的葡萄牙語教育問題，對香港的葡萄牙語教育提供了資助。白樂嘉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澳葡政府試圖鼓勵香港的葡萄牙語學習，用小額資助的辦法，在香港的學校中推進葡萄牙語學習。港英當局接受了澳葡當局的這種資助辦法，將葡萄牙語作為香港的學校畢業證書中的課程和香港大學入學考

試的科目。但那些努力不太成功。戰後，這個運動被給予了更大的關注，隨着來自澳門資助的增加，一所葡萄牙語學校成立了。港英政府在九龍為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校址。在此校址上興建了一座良好的教學樓。它被證明是一所受歡迎的學校，有助於葡萄牙語在香港殖民地獲得更廣泛的使用。”⁽³⁶⁾ 這家學校，即香港賈梅士學校 (Escola Camoens in Hong Kong)。

居港葡人對澳門史展開學術研究

20世紀上半葉，居港葡人中的一些精英人士開始對澳門歷史展開學術研究活動。

一、徐薩斯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對澳門歷史的研究

徐薩斯家族的創始人為米格爾·徐薩斯 (Miguel de Jesus)，18世紀生於巴西，五歲來澳門。其第三代安東尼奧·徐薩斯 (João António de Jesus) 於香港開埠時即赴香港謀生，為最早遷居香港的澳門葡人之一，曾娶妻三次，生下十名子女。徐薩斯為其中之一。他1863年3月14日生於香港，一生未婚，鑽研學問，主治澳門史，重要論著有《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葡萄牙與澳門：經濟和政治問題》(Portugal e Macau: Problemas económicos e políticos)、《葡萄牙的未來》(O que será de Portugal)、《挽救葡萄牙》(A Salvação de Portugal) 等。

《歷史上的澳門》於1902年在香港由別駕洋行公司 (Kelly and Walsh) 出版，該書長達358頁，是治澳門史、中外關係史的學者廣泛參考使用的史學資料。徐薩斯利用了大量的葡文原始資料，對葡人內部活動情況的描述十分真實、具體。他還努力搜尋和利用已翻譯成英文的漢語史料。徐薩斯努力形成一種持久的理解澳門歷史的史學方法，將澳門歷史視為一種完全政治性的題材，即“議事公局權力”的結構。按照他的看法，是議事公局建立和捍衛了澳門的自主。不過該書

缺乏社會史的研究，忽視了澳門城形成及發展的複雜過程中的文化特性。《歷史上的澳門》出版後，在澳葡政府官員中及大多數葡人中贏得了一片喝彩聲，澳門議事公局因徐薩斯出版了“迄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對他進行了表彰。⁽³⁷⁾

1926年，在白樂嘉的主持下《歷史上的澳門》再版，徐薩斯同時為該書增補最後三章，詳述了葡萄牙人到澳門以後進行殖民地建設的前因後果，並把澳門同香港和上海的繁榮情景進行比較，使讀者讀後產生對澳門的極為負面的印象。徐薩斯認為，這種負面印象的產生是由於葡國政府以及澳葡政府向來對澳門的放任態度及殖民政策的錯誤所致。他進而對葡國政府和澳葡政府的施政進行了毫無忌諱的批評。澳門的報紙爭先將再版的《歷史上的澳門》之梗概予以介紹，並在澳門輿論界形成了強大的衝擊波。由此，葡萄牙國上議院議員弗蘭西斯科·席爾瓦 (Francisco A. da Silva) 在澳門《故鄉》報上發表文章，對再版的《歷史上的澳門》予以強烈抨擊，認為該書觀點對葡國及其國民的威信造成極大的傷害。爾後，《故鄉》報發表社論，對徐薩斯關於澳門及葡國的意見提出了批評。同年，《歷史上的澳門》由澳門慈幼商業印刷公司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and Tip. Mercantil) 再版，頁數增至514頁。鑒於其對澳葡政府的批評，澳門政府於6月15日發佈對《歷史上的澳門》的禁賣令，並對徐薩斯的住宅和印刷廠進行搜查，沒收庫存圖書，並追回已賣出的圖書，將其最後三章全部公開燒燬。該書影響巨大，被翻譯成其它文種，例如香港大學牛津出版社1984年版、澳門東方書局1990年葡文版 (Macau Histórico)、澳門基金會2000年中文版等。⁽³⁸⁾

二、罷辣架父子的澳門歷史研究

罷辣架長年為居港澳門葡人爭取權益，在香港及澳門葡人社區中皆甚具聲望。1942年秋天，當他在澳門避難時，獲澳門總督戴思樂 (Gabriel Mauricio Teixeira) 委託，準備寫一本有關葡萄牙人

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歷史書。他為此做了整理資料。但由於有關資料皆於香港，且因戰亂散佚，他祇能在澳門重新整理資料。然而這部著作未及付梓，罷辣架就在1944年遽然去逝。他未竟之業，則由其長子白樂嘉整理完成，名為《在香港及中國的葡萄牙人》(*The Portuguese in Hongkong and China: their beginning,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during one hundred years*)。此書在香港出版，共206頁；1998年，澳門基金會將其重印，共242頁。這部著作共分十二章，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其一，葡萄牙人東來中國，包括了兩章：第一章“早期發現來中國海道的葡萄牙人航海”，第二章“葡萄牙人加深了使欲與葡萄牙和平與友誼的中國人的印象”。這兩章主要介紹了亨利王子、達伽馬抵達印度的努力，迪亞哥(Diogo Lopes de Sequeira)抵達麻六甲、1517年葡人首次抵達屯門，葡萄牙人隨後在中國沿岸的廣東、福建、浙江的活動，1637年英國人威德爾首次來澳門等內容。其二，葡萄牙人與耶穌會士來華，包括兩章，第三章“葡萄牙人的護教與在澳門的耶穌會學院”(包括澳門教區、聖保祿書院、大三巴牌坊、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進京、聖若瑟修院等、上海天主教發展)，第四章“耶穌會士來華服務、葡萄牙國家利益的服從”(主要介紹明清兩代在宮廷服務的葡萄牙籍耶穌會士，他們在中國政局變換中所起的作用，他們所傳播、引種的新植物)。其三，澳門所反映的葡萄牙、荷蘭、英國三者之間的關係，即第五章“荷蘭和英國對葡萄牙人貿易的嫉妒，英國人在澳門，土生葡人族群”。在此章作者討論了英國人首次來澳門、荷蘭人對澳門的進攻，東印度公司與對華貿易，鴉片輸入。特別是作者站在葡萄牙歷史學者徐薩斯所持的極端殖民主義立場上，用大量篇幅批評龍思泰在其著作《早期澳門史》關於葡萄牙人對澳門主權問題的結論。其四，英國佔領香港與葡萄牙人遷居香港，即第六章“在中英戰爭期間英國人對澳門的保護，義律值得紀念的公告”和第七章“來自葡萄牙人與其他人的記載中的早期香港，義律的

返國”。它們主要討論了在鴉片戰爭中英國人與澳門葡萄牙人的關係及香港開埠初期的情況。作者是站在英國人的立場上來介紹的。其五，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即第八至十二章。進入19世紀之後，澳門經濟弊端、政治動盪、民不聊生。鴉片戰爭之後，香港開埠為生活在惶恐之中的澳門葡萄牙人提供了一個新的發展機會。他們紛紛遷居香港，在香港逐步成為了一個社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目前學術界關注並不夠，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主要是布力架父子的一些著作。在這五章中，作者主要介紹了早期葡萄牙人在香港的定居者，葡萄牙人社區在香港的成長(葡萄牙人充當譯員)，港澳早期關係(葡萄牙人在東方的航運業最後的日子)，香港土地開發中的葡萄牙人(包括九龍地區的開發者，舊有居港葡萄牙人的一些有意義的人物)。

罷辣架的其它著作還有：1)《在香港的外國人的權力》(*The Rights of Alie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1895*)；2)《本地銀行：它們的創辦與功能，從香港經濟危機來考慮》(*Native Banks: Their Formation and Their Function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n Hong Kong, 1925*)；3)《香港的葡萄牙開荒者：九龍的園藝實驗》(*Portuguese Pioneers of Hong Kong: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s at Kowloon, Macau: The Macao Review, 1930*)；4)《葡萄牙人的開拓：香港一百年》(*Portuguese Pioneering: A Hundred Yea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Ye Olde Printerie, 1941*)。此外，他還編輯過雙月刊《困境與結局》(*Odds and Ends: An Illustrated Journal, Hong Kong, 1896-1897*)。

白樂嘉治史尤重澳門史，治學注重史料搜集，包括1,000餘種書籍，200箱手稿，100多卷各種報刊，數百幅有關澳門、香港、中國內地和葡萄牙的地圖，4,000餘幀中國、日本的照片，其中涵蓋葡萄牙人各個時期在遠東活動的歷史照片，現大多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白樂嘉的著作較多，其中《西方開拓者及其

發現澳門》(*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 為其澳門史研究的代表作，與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同樣享有盛譽。⁽³⁹⁾ 它由澳門官印局 (Imprensa Nacional) 1949年出版，1980年重印；其法文版 (*Les pionniers de l'occident et la découverte de Macao*) 由 Maurice Echinard 翻譯，西貢的 France-Asie 於1950年出版。白樂嘉此著作包括下列篇章：前言；“前事及影響”，包括“葡萄牙在16世紀的貿易，在亞洲水域的貿易，西班牙帶來的噩夢，開拓者”；“地平線延伸”，包括“早期的冒險，遠東貿易”；“尋找家園”，包括“與中國的早期關係，不確定性，返回廣東，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澳門的建立”，包括“‘阿媽’港，掃清海域，在北京事件之後，澳門的第一批定居者，澳門成為前哨站”；附錄，包括注釋，五份澳門開埠史重要的葡文信件、論著章節的摘錄等。

白樂嘉的其他研究著作還有：1) 《圖片中的澳門》(*Picturesque Macao, Macao: Po Man Lau*, 1926)；2) 《澳門英國人墓地的墓碑》(*Tombstones in the English Cemeteries at Macao*, Macao: Macao Economic Services Dept., Publicity Office, 1940)；3) 《對香港與英葡友誼的特別補遺》(*Special Supplement Dedicated to Hong Kong and Anglo-Portuguese Amity*, Macau: Notícias de Macau, 1951)；4) 《香港與澳門》(*Hong Kong and Macao: 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estivities in His Honour*, 1951, Hong Kong: Graphic Press, 1960)；5) 《澳門印刷業的開始》(*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3。其葡文譯本(*Primórdios da Imprensa em Macau*), Macau: Edição do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1965)；6) 《過去之聲》(*A voz do passado: redescoberta de a coleção de vários factos acontecidos nesta mui nobre cidade de Macao*, Macau: Edição do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1964)；7) 《中國的陷落，1513年：

歐維士航行來華：一些相關資料彙編》(*China Landfall, 1513: Jorge Alvares' Voyage to China: a Compilation of Some Relevant Material*, Hong Kong: K. Weiss, 1965)；8) 《香港葡萄牙語教育：其歷史的一些解釋》(*O ensino da lingua portuguesa em Hongkong: algumas notas sobre a sua história*,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9)。

白樂嘉增補、修訂、註釋的他人著作有：1) 《澳門早期醫療實踐》(*Early Medical Practice in Macao*, Macao: Inspeção dos Servicos Economicos, 1935)；2) 《在澳門的多明我會修院與教堂》(*The Convent and Church of St. Dominic at Macao*,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1)；3) 孟三德著《日本首任赴歐使節》(*Primeira embaixada do Japão à Europa*, Macau: 1961)。

白樂嘉編輯的圖書有：1) 《香港商業研討會》(*Hong Kong Business Symposium: a compilation of authoritative views on the administration, commerce and resources of Britain's Far East outpost*,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57)；2) 《澳門》(*Macao: a short handbook*, Macao: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Dept., 1963, 1968, 1970)。

白樂嘉編輯的書目有：1) 《博克塞著作書目》(*A Biblioteca do Capitão C.R.Boxer*, Macau: Escola Tipografica do Orfanato, 1938)；2) 《香港醫療史書目》(*A Bibliography of the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4)；3) 《香港書目》(*A Hong Kong Bibliograph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5)；4) 《中歐關係圖書目錄》(*Catalogue of a Collection of Books Relating to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Macao*, 196-)。

白樂嘉的演講報告有：《1961年11月24日在香港大學的演講》(*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n 24th Nov., 1961,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resentation of a set of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by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to the University, 1961)等。

【註】

- (1) 詳見葉農著〈19世紀後半葉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考〉，載《世界民族》2010年第6期，頁51-59。
- (2) 參見李長森著《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8月)，頁208-221。
- (3) António M. Pacheco Jorge da Silva, *The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 Pictorial History*, Macau: Conselho das Comunidades Macaenses,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2007, p. 32.
- (4) 參見吳志良等編《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5卷，頁2640、頁2654。
- (5) Austin Coates, *A Macao Narrati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3.
- (6) 參見吳志良等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頁2756-2757。
- (7) 參見吳志良等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頁2757。
- (8)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Hong Kong: Graphic Press Limited, 1960, p. 89.
- (9) Leo de Almada e Castro, "Some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in *Instituto Portuguese de Hongkong Boletim*, No. 2, Setembro, 1949, p. 274.
- (10) António M. Pacheco Jorge da Silva, *The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 Pictorial History*, pp. 28-30.
- (11) 轉引自吳志良等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頁2482。
- (12) 參見吳志良等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頁2391-2392。
- (13) <http://zh.wikipedia.org/zh-cn/>
- (14) <http://zh.wikipedia.org/zh-cn/>
- (15) Leo de Almada e Castro, "Some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in *Boletim do Instituto Portuguese de Hongkong*, No. 2, Setembro, 1949, pp. 272-273.
- (16) <http://zh.wikipedia.org/zh-cn/>
- (17) <http://www.ribeirofamily.com/Nostalgia/legacy.htm>.
- (18) Leo de Almada e Castro, "Some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in *Boletim do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Hongkong*, No. 2, Setembro, 1949, p. 272.
- (19) António M. Pacheco Jorge da Silva, *The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 Pictorial History*, p. 25 ; 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頁198、200。
- (20) J. P. Braga, *The Portuguese in Hongkong and China*, pp. 145-146.
- (21)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 89.
- (22)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I, pp. 548-549.
- (23) <http://zh.wikipedia.org/zh-cn/>
- (24) 此段所引資料，分別見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p. 93, 83-84; António M. Pacheco Jorge da Silva, *The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 Pictorial History*, pp. 24-25.
- (25) Leo de Almada e Castro, "Some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in *Boletim do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Hongkong*, No. 2, Setembro, 1949, pp. 272-273.
- (26) Frederic A. Silva, *The Sons of Macao, Their History and Heritag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1996, p. 31.
- (27) António M. Pacheco Jorge da Silva, *The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 Pictorial History*, p. 46.
- (28) António M. Pacheco Jorge da Silva, *The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 Pictorial History*, p. 47.
- (29) Leo de Almada e Castro, "Some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in *Boletim do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Hongkong*, No. 2, Setembro, 1949, pp. 272-273.
- (30)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p. 144-145.
- (31)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Macau: Notícias de Macau, 1965, pp. 276-277.
- (32) 參見李長森著《近代澳門外報史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29。
- (33)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83.
- (34) 參見前揭《澳門編年史》(第5卷)，頁2482。
- (35) 參見《澳門省政府施政報告》，1911年，附件10，頁2-3。
- (36)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 143.
- (37) 前揭《澳門編年史》(第4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頁2110。
- (38) 參見Manuel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LXX, No. 823, Abr. 1973, pp. 248-256; No. 824, Maio. 1973, pp. 333-338. 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冊)，頁2082。"J. M. Braga, Breve evocação na sua morte", in *Revista de Cultura*, No. 5, 1988. 前揭《澳門編年史》(第5卷)，頁2437、2451-2452。
- (39)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III, pp. 333-334;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34-144; "J. M. Braga, Breve evocação na sua morte", in *Revista de Cultura*, No. 5, 1988.